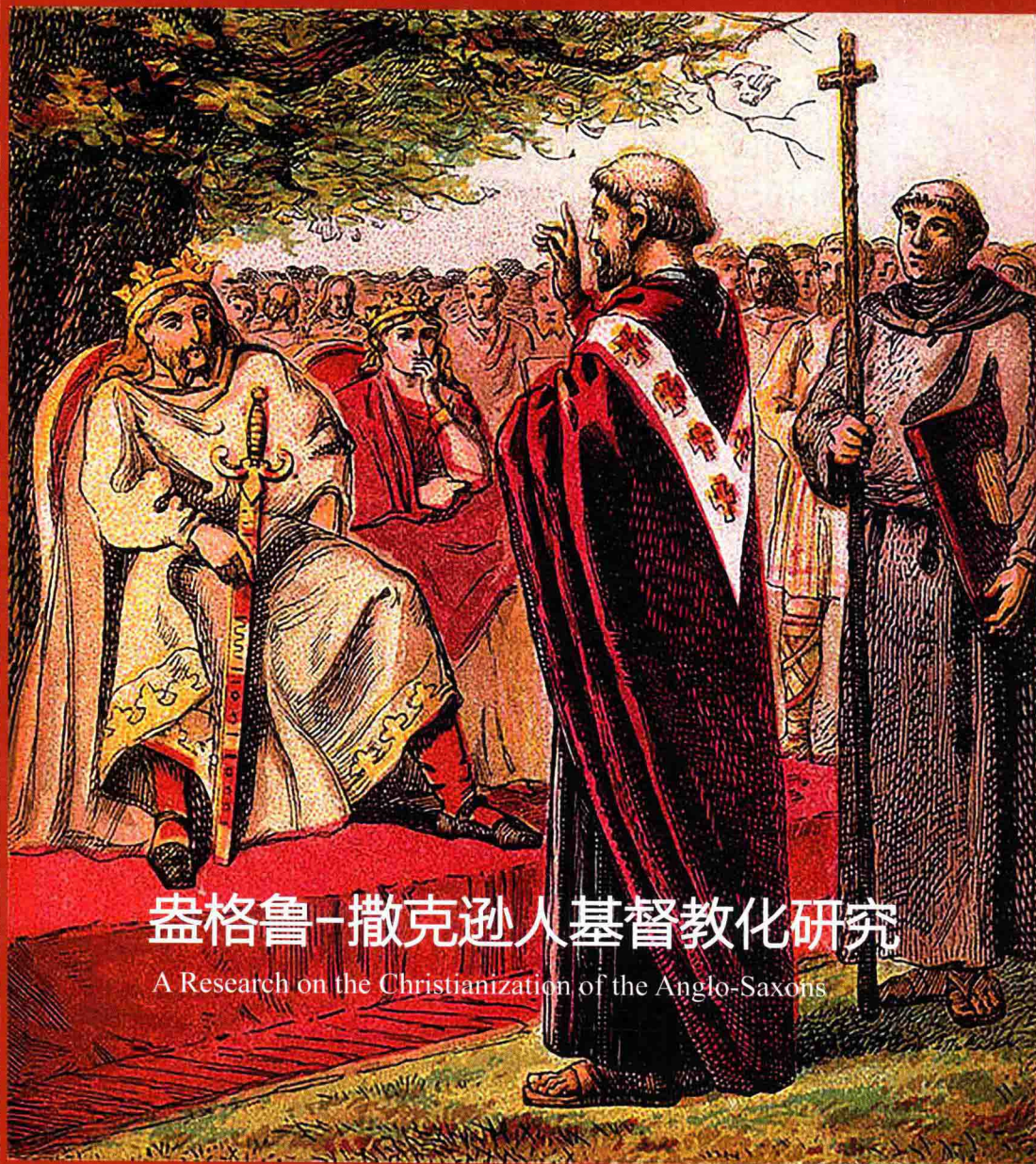




盎格鲁-撒克逊人基督教化研究

A Research on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the Anglo-Saxons

徐晨超 著

盎格鲁-撒克逊人基督教化研究

A Research on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the Anglo-Saxons

徐晨超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盎格鲁-撒克逊人基督教化研究 / 徐晨超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308-16480-1

I. ①盎… II. ①徐… III. ①基督教史—研究—英国
IV. ①B97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3464 号

盎格鲁-撒克逊人基督教化研究

徐晨超 著

责任编辑 陈佩钰(yukin_chen@zju.edu.cn)

责任校对 吴伟伟 沈小龙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960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86 千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480-1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前 言

西欧中世纪文明脱胎于古罗马因素与日耳曼因素的结合,而盎格鲁-撒克逊人等部族的基督教化进程是这两方面得以结合的重要内容。这一进程,不仅体现为信仰的转变,而且构成催生出西欧中世纪文明的有力杠杆,具有积极性和进步性。研究西方古代民族的改宗、基督教化的过程是了解民族信仰从何而来、一个现代民族如何形成,乃至欧洲中世纪政治版图建构历史的重要途径之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改宗,其后他们的宗教信仰、社会文化的转变,以及教会在日耳曼人社会内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发展进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但目前国内研究中,尚未见从民族宗教信仰转变的角度来探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早期历史的相关著作。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早期基督教化问题研究的著述也不多见,对中世纪前期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认识也大多仍限于《英吉利教会史》,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梳理与挖掘。本书旨在探讨国内相对薄弱的研究领域,希冀借此为国内的中世纪欧洲史和基督教史方面的研究添砖加瓦。

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内的多数日耳曼人对基督教的皈依都是由本族首领发起,自上而下推广普及的宗教变革。通常意义上,日耳曼人的皈依都是以国王的改宗为标志,比如克洛维(Clovis I)的兰斯(Reims)受洗和埃塞尔伯特(Ethelbert I)的坎特伯雷(Canterbury)受洗事件。在皈依的过程中,国王与教会的合作是推动基督教化的最大动因。政教关系从法兰克人到盎格鲁-撒克逊人,始终贯穿于日耳曼人改宗的主线之中。盎格鲁-撒克逊王室对改宗的政治推动力,包括某些异教徒国王的负面影响是研究民族改宗史时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本书前半部分所探讨的中心内容。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一个民族(或称为古代部族)的基督教化过程远非几次标志性事

件所能涵盖,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来得以实现。以往学界的研究多重在考察王室贵族的洗礼皈依,而忽视了基督教对民众在精神信仰层面的改造。基于统治上层政教联盟的需要而实施的宗教信仰变革,在多大程度上为其族民所接受,民众的信仰又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转变的过程?笔者认为,精神信仰的转变的实现,实际上是一个基督教对多神教神灵、宗教仪式和观念的取代过程。

接受基督教对民风未开的日耳曼人而言并不是一件易事。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1〕},因不列颠地区本身的罗马化程度较低,多神教迷信和日耳曼人遗风仍长期存留,其影响甚至一直延续至七八世纪。在改宗期间,包括肯特(Kent)、埃塞克斯(Essex)、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诺森伯里亚(Northumbria)、威塞克斯(Wessex)在内的诸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多神教复兴运动。针对这种现象,教会对死后世界的观念和赎罪理论作出了一些修正,并采纳了一些折衷的政策。教会通过这种途径劝导、教育盎格鲁-撒克逊人摒弃部落旧俗和多神教文化,接纳基督教伦理观是本书所要探讨的另一大主题。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改宗过程,包含着许多相互关联的因素,譬如基督徒与异教徒的关系,教权与王权的关系,教规与国王法令的关系,等等。在处理这些材料时,笔者试图尽可能完整地梳理出从6世纪末至8世纪初这段时期里,盎格鲁-撒克逊人宗教演进过程的大致脉络。西方中古早期的社会生活与宗教息息相关,本书在介绍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和上层阶级的皈依的同时,试图结合考古材料和当时的社会、宗教背景,对中下层盎格鲁-撒克逊民众的生活概貌、社会风俗和当时仍遗留的多神教迷信问题做一番考察。此外,笔者冀图通过引入对法兰克人的改宗过程的论述,对两个古代民族的基督教化历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一些异同之处的比较,探究相互之间的基督教化的影响,并对某些历史争议之处作一点补充与诠释。

〔1〕 盎格鲁-撒克逊时代(Anglo-Saxon Period),史学界一般将其定义为从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开始,至征服者威廉一世(William I the Conqueror)完成诺曼征服为止的一段历史时期(约450—1066年)。本书所涉及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活动大体都在此时期的前半段。本书使用的“英吉利”一词,并非指狭义上始自829年威塞克斯王爱格伯特(Egbert of Wessex)对英吉利完成的名义上的统一,而是泛指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之后的占领区,对应于“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Anglo-Saxon England)”一词。

目 录

绪 论	001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析	003
第一章 古代不列颠的基督教	023
第一节 基督教传入罗马不列颠	024
第二节 凯尔特教会	030
第三节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和基督教的残存	036
小 结	049
第二章 东南三国的基督教化	052
第一节 大格雷戈里传教与法兰克人	052
第二节 基督教在肯特地区的初步建立	065
第三节 基督教在埃塞克斯和东盎格利亚的初步确立	080
小 结	088
第三章 西北三国的基督教化	090
第一节 基督教在诺森伯里亚的初步确立	090
第二节 爱尔兰传教团	098
第三节 基督教在威塞克斯和麦西亚的初步确立	107
小 结	112
第四章 教会的发展与基督教化的深入	114
第一节 惠特比会议	114

第二节 西奥多重划主教区	124
第三节 基督教在苏塞克斯和怀特岛的初步确立	130
第四节 威尔弗里德与英吉利教会的成长	135
小 结	150
第五章 丧葬风俗观念的基督教化	152
第一节 7 世纪早期的王家墓地	153
第二节 大瘟疫与死后世界观念的基督教化	162
第三节 洗礼与死后世界观念的转变	173
小 结	177
第六章 世俗王权在基督教化中的作用比较	180
第一节 从“神王”到圣徒	180
第二节 埃塞尔伯特与克洛维改宗的比较	182
第三节 王权对改宗的影响力的比较	187
小 结	193
第七章 余 论:对基督教化政策的两点比较	196
第一节 赎罪文化	196
第二节 圣徒奇迹与圣地、圣徒遗物崇拜	210
小 结	228
结 语	230
附 录	235
主要参考文献	256
索 引	279
后 记	283

绪 论

基督教化是日耳曼人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历程。盎格鲁-撒克逊诸国接受基督教始自肯特,直至苏塞克斯(Sussex)和怀特岛(Wight)的皈依,前后经历了近百年时间。盎格鲁-撒克逊人同绝大多数日耳曼人一样,其基督教化进程一般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以国王为代表的王室贵族接受洗礼,改宗基督教。二是教会在城镇、乡村的管理体系基本建立,教堂、修道院的教牧工作大体覆盖整个英吉利地区。三是民众普遍地接受基督教伦理观念,遵循基督教的生活方式。从国王的受洗皈依到普通民众接受信仰,一个古代民族的改宗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政治因素与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必须从国王、教会、民众等多个视角切入剖析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问题,才能得出较为全面的答案。通常意义上来说,只有绝大部分族民接受了基督教生活方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才可称得上完成。但由于民众层面关注的对象较为宽泛,现有的史料不足以佐证,评判标准也较为模糊,因此,本书在前半部分对叙述史的梳理分析基础上,后半部分主要通过考古资料、教令、布道文,以及与法兰克人的比较中寻找证据,从丧葬风俗、死后世界观念、赎罪文化和圣徒奇迹等方面阐述教会对多神教文化的改造,力图从人类学和民族学角度得出基督教化的初步结论。

在国王方面,本书前三章侧重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国王改宗的动因和王室贵族在改宗中的作用分析,着眼于考究王权对改宗的策动作用。从分析、理清罗马、肯特和法兰克王国三者间的关系入手,本书对大格雷戈里传教中的政治因素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一些学者指出肯特与奥斯特拉西亚(Austrasia)、纽斯特里亚(Neustria)结成的政治联盟是推动前者改宗的重要因素,但笔者认为,过分强调法兰克王国对肯特改宗的影响力也是不适宜的。本书以法兰克公主贝尔莎出嫁时间为切入点,对这场政治联姻中一些待商榷的问题进行了考证与推论。王权不仅是改宗初期的决定性要素,并

且也会影响到之后基督教的发展道路。传统观点认为,664年惠特比会议(Synod of Whitby)的召开是因为爱尔兰传统与罗马传统所遵循的复活节日期不同而引发的。但这可能只是会议召开的一个契机,这次会议召开的根本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缘于王室内部的政治斗争。

在教会方面,循罗马教会与爱尔兰教会各自的传教轨迹,对其传教理念与方法做了一些比对。爱尔兰教会的修道院体制与罗马主教区体制相比,更适合于早期英吉利北部的散居式的乡村社会。罗马传统则更倾向于强调主教的权威,更注重世俗的管理事务,与南部城镇较为密集的地区较为相宜。盎格鲁-撒克逊诸国的基督教化历程中,罗马与爱尔兰的宗教影响是混合交融在一起的,因此不可孤立地看待二者在改宗中起到的作用。本书第四章通过重点研究威尔弗里德主教的生平,探讨教会文化的融合与变迁,从中反映出本土的盎格鲁-撒克逊教会的成长史。

民众从多神教到基督教过程中精神信仰层面的变化是本书考察的另一重点,这也是西方学界目前研究的热门领域。本书第五章基于萨顿胡(Sutton Hoo)、普利托威尔(Prittlewell)和耶威林(Yeavinger)等墓地的考古报告,从陪葬品等考古实物的变化来看盎格鲁-撒克逊人信仰的转变问题。从传统丧葬风俗向基督教风俗的转变衍生出一个问题,即盎格鲁-撒克逊教会是如何向大众灌输死后灵魂按生前所为的善或恶进入天堂或地狱的观念的?笔者在当时爆发的大瘟疫与教会赎罪理论找到了一些联系点。6世纪下半叶大瘟疫的流行在对教会造成打击的同时,反过来也给教会制造了机会,教育、引导了那些多神教信仰者和动摇派的皈依。人们对瘟疫的恐惧使得部分人群使用传统葬仪阻止死者亡魂的归来,而这也迫使教会聚焦于考虑灵魂、丧葬和死后世界等教义问题,采取了针对性的变通政策。

本书的最后两章就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兰克王权对改宗的影响力,以及二者教会对多神教文化的改造政策等方面做了比较分析,冀图借此探究二者在基督教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日耳曼人在基督教化过程中的相似性。盎格鲁-撒克逊诸国与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 Dynasty)相比,基督教化进程出现了多次受阻甚或倒退现象,这是否与盎格鲁-撒克逊王权相对羸弱存在很大关联?盎格鲁-撒克逊与法兰克教会都存在赎罪观念和圣徒崇拜,这是否意味着两支日耳曼民族精神信仰的转变过程存在着很大共性?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潜心思的问题。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析

一、盎格鲁-撒克逊人基督教化方面的研究概况

1. 史料整理

近代对盎格鲁-撒克逊人基督教化时代的编年史、圣徒传记、使徒书信、教令教规、敕令法典、诗歌散文等原始材料的编辑考证和翻译的系统性工作,在 19 世纪已发展得较为成熟。除了欧洲大陆^{〔1〕}学者如神父米涅(Jacques Migne)主编的巨作《教父著作全集》(*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和篇幅浩繁的《德意志史料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涵盖的部分之外,由诸多英吉利学者参与编写共计 255 卷的《中世纪英国和爱尔兰史(劳斯系列)》(*Rolls Series*)也在 19 世纪下半叶陆续出版。约瑟夫·史蒂文森(Joseph Stevenson)的《英国教会历史学家作品集成》共 5 卷,前 2 卷是早期教会史的汇编,囊括了比德的作品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和《伍斯特佛罗伦萨修士的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Florence of Worcester*)等史料,编者一一加以翻译并附以注释。^{〔2〕}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作为考察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重要的史料,多次被考订、整理出版。在拉丁文版本中,一般以基于 C 底本的卡洛斯·普拉默(C. Plummer)版为参考标准。^{〔3〕}在书信、布道书方面的材料,可以参阅《尼西亚和后尼西亚教父选集》(*A Selected Library of the Nicene*

〔1〕“欧洲大陆”被称为欧洲本土或简称大陆,排除英国、爱尔兰、冰岛等岛屿。本书以下均作简称“大陆”。

〔2〕 *The Church Historians of England*: Vol. I, pt. 2. *The Historical Works of the Venerable Bede*, ed. and trans. Joseph Stevenson, London; Seeleys, 1853; *The Church Historians of England*: Vol. II, pt. 1. *The Anglo-Saxon Chronicle. The Chronicle of Florence of Worcester*, ed. and trans. Joseph Stevenson, London; Seeleys, 1853.

〔3〕 St. Bede, *Venerabilis Baedae Opera Historica*, ed. C. Plummer, London, Edinburgh, New York: E Typographeo Clarendoniano, 1896.

and Post-Nicene Fathers),该书在早期基督教著作的英译本中是较为出色的。^{〔1〕}在国王法令方面,有本杰明·索普(B. Thorpe)编写的《英国古代法令与制度》(*Ancient Laws and Institutes of England*)一书,囊括了从埃塞尔伯特至征服者威廉(William I the Conqueror)等历代君王颁布的一系列法典,并包含了盎格鲁-撒克逊语、拉丁语和现代英语三种对照文本。^{〔2〕}在教会法和教会文件方面,以亚瑟·哈登(A. W. Haddan)和威廉·斯塔布斯(W. Stubbs)编辑的3卷本《大不列颠和爱尔兰教会会议和文件》(*Councils and Ecclesiastical Documents Relating to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较为全面。^{〔3〕}此外,约翰·乔纳森(J. Johnson)编写的《英吉利法令和教会法》(*A Collection of the Laws and Canon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4〕}

在当代的编辑整理的综合性史料出版物中,多萝西·怀特洛克女士(D. Whitelock)编辑的《英国历史文献集成》第一卷(*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500—1042, Vol. I*)对500—1042年间的各种英国编年史、书信和国王法令等作了整理集成,是研究中世纪早期盎格鲁-撒克逊史的很好的文献史料。^{〔5〕}而凯文·クロス利-霍兰德(K. Crossley-Holland)编写并翻译的《盎格鲁-撒克逊世界》(*The Anglo-Saxon World*)则是对怀特洛克的工作的一个有力的补充。该书包括有《贝奥武甫》(*Beowulf*)在内各种英雄史诗、挽歌、宗教诗歌等材料。^{〔6〕}英国学界始自20世纪80年代的对艾尔弗雷德大王(Alfred the Great)时期编纂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9个底本的整

〔1〕 *A Selected Library of 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First and Second Series, NPNF, ed. Philip Schaff. Grand Rapids, Buffalo, New York: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86—1900.

〔2〕 B. Thorpe, *Ancient Laws and Institutes of England*, London, 1840, 1st, New Jersey: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2004.

〔3〕 *Councils and Ecclesiastical Documents Relating to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ed. A. W. Haddan and W. Stubbs, 3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69—1878.

〔4〕 *A Collection of the Laws and Canon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2 vols., ed. J. Johnson, London: Bobert Knaplock, 1850.

〔5〕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500—1042, Vol. I*, ed. and trans. D. Whitelock,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55.

〔6〕 *The Anglo-Saxon World*, ed. and trans. Kevin Crossley-Holland, Woodbridge: Boydell Press, 2nd, 2002.

理评注的出版工作,现仍在进行中,其中最为完整的盎格鲁-撒克逊语底稿是17世纪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德(Laud)捐赠的E底本。^{〔1〕} 现今参考的现代英译本一般是基于A-E底本的选编版,或迈克尔·斯旺顿(M. Swanton)的完整版。^{〔2〕} 在《英吉利教会史》的英译本中,伯特伦·科尔格雷夫(B. Colgrave)、罗格·麦纳斯(R. Mynors)在1969年合作整理并翻译出版的《比德关于英吉利子民的教会史》(*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是现代英语的经典译作。^{〔3〕} 科尔格雷夫还编译了惠特比匿名修士的《大格雷戈里传》(*The Earliest Life of Gregory the Great*),比德的《教会史》中许多材料即源于此书。^{〔4〕} 在英吉利圣徒传记的译本中,以D. H. 法莫(D. H. Farmer)编辑的《比德时代》(*The Age of Bede*)较为全面,此书包含了比德的《卡思伯特传》(*Life of Cuthbert*)、艾迪乌斯(Eddius Stephanus)的《威尔弗里德传》(*Life of Wilfrid*)和比德的《贾罗修道院院长列传》(*Lives of the Abbots of Wearmouth and Jarrow*)等5部传记。^{〔5〕} 在教会法方面,可参考的是詹姆斯·克劳斯(J. Cross)和安德鲁·哈默(A. Hamer)对11世纪初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Wulfstan)收集的教会法的编译本,以及奥斯丁·埃文斯(Austin P. Evans)主编的包括大主教西奥多(Theodore of Canterbury)的《西奥多赎罪书》(*Penitential of Theodore*)在内的《中世纪赎罪书手册》(*Medieval Handbooks of Penance*)。^{〔6〕}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主要编年史之中,除吉尔达斯(Gildas Sapiens)

〔1〕 *The Anglo-Saxon Chronicle MS. E*, ed. Susan Irvine, Cambridge: D. S. Brewer, 2004.

〔2〕 *The Anglo-Saxon Chronicle*, in: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500—1042*, ed. and trans. D. Whitelock,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55, pp. 135-235; *The Anglo-Saxon Chronicle*, ed. and trans. Michael James Swant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3〕 St. Bede,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ed. and trans. Bertram Colgrave, R. A. B. Myno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4〕 An anonymous monk of Whitby, *The Earliest Life of Gregory the Great*, text and trans. by Bertram Colgra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5〕 *The Age of Bede, Bede: Life of Cuthbert, Eddius Stephanus: Life of Wilfrid, etc.*, trans. J. F. Webb and D. H. Farmer, ed. D. H. Farmer, London: Penguin, 2004.

〔6〕 *Wulfstan's Canon Law Collection*, ed. and trans. James E. Cross, Andrew Hamer, Cambridge: D. S. Brewer, 1999; *Medieval Handbooks of Penance: A Translation of the Principal Libri Poenitentiales and Selections from Related Documents*, ed. Austin P. Ev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8.

的《哀诉不列颠的毁灭》(*On The Ruin of Britain*)^{〔1〕}外,《英吉利教会史》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都已翻译成中文,这些工作都为我们研究盎格鲁-撒克逊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基础。^{〔2〕}

2. 有关对国王的考察

国外目前研究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学术专著有很多。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Anglo-Saxon England*)截至2010年,已陆续出了38卷之多。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改宗、基督教化的著述也是层出不穷。从国王改宗史、教会史、民族史、制度法律变迁、异教信仰留存、文学作品和考古发现等角度来论述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教化史的论文与专著不一而足。

N. J. 海厄姆(N. J. Higham)的《早期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改宗国王的权力与宗教归属》(*The Convert Kings: Power and Religious Affiliation in Early Anglo-Saxon England*)和威廉·A. 钱尼(William A. Chaney)的《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国王的异教迷信:从多神教到基督教的转变》(*The Cult of Kinship in Anglo-Saxon England: The Transition from Paganism to Christianity*)是从国王角度分析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不列颠地区基督教化的两部专著。^{〔3〕}海厄姆在书中指出第一代接受基督教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并未接受传教士带来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信仰基督教纯粹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治。他从肯特与法兰克王国的联系,推测了当时埃塞尔伯特意图与海峡彼岸强大的法兰克人交好的外交方针。作者的这种观点部分来源于肯特地区与弗里西亚(Frisia)及北海东南沿岸地区考古证据的相似性。^{〔4〕}海厄

〔1〕 Gildas Sapiens, *Liber querulus de Excidio et Conquestu Britanniae*, ed. and trans. John Allen Giles, *On The Ruin of Britain*, London: James Bohn, 1st, 1841, Project Gutenberg Etext, 1999.

〔2〕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寿纪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3〕 N. J. Higham, *The Convert Kings: Power and Religious Affiliation in Early Anglo-Saxon Engl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William A. Chaney, *The Cult of Kinship in Anglo-Saxon England: The Transition from Paganism to Christianit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4〕 参见 J. Hines, "The Becoming of English: Identity, Material Culture and Language in Early Anglo-Saxon England", in: *Anglo-Saxon Studies in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Ⅷ, 1994, pp. 49-59.

姆还分析了比德的记载的承继性,他指出,比德作为教会成员,在记述一百多年前的历史时,必参照或照搬了坎特伯雷教会方面的说法。肯特王国的改宗必定比比德所记更为波折。在其另一本著作《英吉利帝国:比德和早期盎格鲁-撒克逊国王》(*An English Empire: Bede and the early Anglo-Saxon kings*)中,海厄姆系统地探讨了比德获取材料的来源和纪史的风格。^{〔1〕}总体来看,海厄姆质疑教会学者的记载,持宗教为政治服务的观点。他的一些看法、假说过于主观,个人色彩较浓,虽有新意,但多是单文孤证,并不足以立论。

有学者从王室多神教迷信留存方面考察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的基督教化状况。威廉·A. 钱尼在《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国王的异教迷信》一书中总结分析了异教遗风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长期存留问题。比如,他指出多神教的遗痕长期保存在国王的名字当中,而这种取名方式一直延续至基督教时代。^{〔2〕}而当国王要实现某一政治目的时,往往利用祭祀活动求得神灵相助,以此得到族民的支持。J. M. 华莱士·哈德里尔(J. M. Wallace-Hadrill)在比较中世纪早期英吉利与大陆地区的日耳曼国王的统治时指出,国王既是地位最崇高的贵族,也是名义上最高的祭司,常常在日常节日的祭祀仪式中作为最高祭司主持献祭仪式。早期英吉利的“神王”(sacred king)统治,常常表现为节庆祭祀与王朝统治,宗教仪式和政治政策相混合的形式。^{〔3〕}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多名国王主动放弃统治进入修道院做修士。克莱尔·斯坦克利夫(C. Stancliffe)在《放弃信仰的国王》(*Kings who Opted Out*)一文中试图解释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一在中世纪早期西欧王室极其罕见的行为很可能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受迫于政治压力。^{〔4〕}这一观点可能忽视了基督教在精神信仰层面的巨大影响力,存有商榷之处。

〔1〕 N. J. Higham, *An English Empire: Bede and the Early Anglo-Saxon King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2〕 William A. Chaney, *The Cul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 England: The Transition from Paganism to Christianit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2.

〔3〕 J. M. Wallace-Hadrill, *Early Germanic Kingship in England and the Continent*, Oxford: Clarendon, 1980, pp. 8-20.

〔4〕 Clare Stancliffe, "Kings who Opted Out", in: *Ideal and Reality in Frankish and Anglo-Saxon Society*, ed. Patrick Wormald, Oxford: Blackwell, 1983, pp. 154-176.

3. 有关教会史的考察

这方面的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教会为论述主体的著作,二是以主教或传教士个人为论述主体的著作。前一类的代表作有 C. J. 戈弗瑞(C. J. Godfrey)所著的《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教会》(*The Church in Anglo-Saxon England*)和约翰·布莱尔(John Blair)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教会》(*The Church in Anglo-Saxon Society*)。^{〔1〕}比较有影响的著作还包括肯尼斯·海奥森-史密斯(K. Hylson-Smith)的《从罗马时期到宗教改革的英格兰基督教 卷一:从罗马时期到 1066 年》(*Christianity in England from Roman Times to the Reformation, Vol. I, From Roman Times to 1066*)以及亨利·迈尔-哈廷(Henry Mayr-Harting)的《基督教来到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The Coming of Christianity to Anglo-Saxon England*)等书。^{〔2〕}第二类的著作有剑桥大学编写的《比德的剑桥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ede*)、皮特·布莱尔(Peter Blair)的《比德的世界》(*The World of Bede*)、乔治·布朗(G. Browne)的《奥古斯丁和他的同伴》(*Augustine and His Companions*)和克林顿·艾伯森(C. Albertson)的《盎格鲁-撒克逊圣徒与英雄》(*Anglo-Saxon Saints and Heroes*)等书。^{〔3〕}

《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教会》和玛格丽特·迪恩斯利(Margaret Deanesly)的《诺曼征服前的英国教会》(*The Pre-Conquest Church in England*)属同一时期的作品。^{〔4〕} C. J. 戈弗瑞对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教会史

〔1〕 C. J. Godfrey, *The Church in Anglo-Saxon Englan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John Blair, *The Church in Anglo-Saxon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 Kenneth Hylson-Smith, *Christianity in England from Roman Times to the Reformation, Vol. I, From Roman Times to 1066*, SCM Press, 1999; Henry Mayr-Harting, *The Coming of Christianity to Anglo-Saxon England*,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third edition, 1991.

〔3〕 Scott De Gregorio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ed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eter Hunter Blair, *The World of Bed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George F. Browne, *Augustine and His Companions: Four Lectures Delivered at St. Paul's in January 1895*, Whitefish: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6; Clinton Albertson, *Anglo-Saxon Saints and Heroe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67.

〔4〕 Margaret Deanesly, *The Pre-Conquest Church in 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论述得较为全面,从坎特伯雷大主教奥古斯丁到弗里西亚大主教威尔布罗德的传教经历,从罗马与爱尔兰的教派冲突到罗马派取得最后胜利,从早期英吉利的建筑艺术到基督教颂诗等都有介绍,但也因内容过于庞杂,造成了全书的重点论证不够深入。亨利·迈尔-哈廷的《基督教来到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则在前两人工作的基础上,不仅大体阐明了盎格鲁-撒克逊人改宗的过程,而且进一步探讨了改宗历史表象下的复杂的历史内容。该书将盎格鲁-撒克逊教会与同时代的爱尔兰、高卢、罗马教会作了较多的联系比对。另外,作者特别考察了奥古斯丁与教廷的联系,详细地探讨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是如何遵从教皇大格雷戈里(Gregory the Great)的指示,在英吉利建立起罗马主教区的。

2005年出版的约翰·布莱尔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教会》主要聚焦于教区修道院的宗教生活,在该书前半部分记载了公元850年之前的盎格鲁-撒克逊教会史。作者注重教会与普通教民的联系,结合考古证据、古代地形等方面,深入地研究了基督教在不列颠地方上的发展历程。他在书中讨论了在再构建基督教文明时遗存的不列颠-罗马文明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这一遗存并未被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所抹去。比如,他指出以现存的基督教碑文来看,不列颠西海岸5—6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是来自高卢的影响,而是直接来源于不列颠本身的传统。他继而认为,与法兰克人入主高卢便接受基督教信仰不同,盎格鲁-撒克逊人初来不列颠时未受不列颠本身基督教的熏陶影响,可能是为了刻意与信仰基督教的凯尔特人保持距离。^{〔1〕}在论及比德笔下的7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与图尔的格雷戈里主教记载的6世纪的法兰克社会时,他认为法兰克教会重视圣徒、圣物和圣地的风气似乎未体现于比德的记载大多是因为编年史作者的世界观和倾向不同。在保证教堂在教区的精神核心地位的同时,在教会的工作中,实际上还是将尊崇圣徒、圣地的地位放在拓展教区之上。

布莱尔在总结了亨利·迈尔-哈廷、皮特·布朗、理查德·弗雷切尔、N. J. 海厄姆以及 M. 卡维尔等人的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五个阶段再建基督教

〔1〕 John Blair, *The Church in Anglo-Saxon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8 and 23-24.

化文化的看法,依次是 597—616 年、616—625 年、625—642 年、653—664 年、7 世纪 70—80 年代这几个时间段。关于盎格鲁-撒克逊史和教会史方面,布莱尔还有许多著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 2008 年翻译出版了他的《盎格鲁-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1〕}该书在宏观视野下对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有一个较为完整、清晰的认识与把握,但在基督教化方面的论述着墨不多。

在第二类书中,皮特·布莱尔的《比德的世界》是一部比较突出的作品。在此书的第四部分,作者讨论了比德时代的宗教日常生活、教会的教育和所使用的《圣经》等方面内容。这对了解教会如何教化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普通居民是很有帮助的研究。2010 年新近出版的《比德的剑桥指南》是继《古代英国文学的剑桥指南》后剑桥大学组织编写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系列研究丛书的第二卷,分比德的生平、著作和影响三方面,展示了诸多西方学者研究比德时代的最新成果集成。

4. 有关考古发现、民族史的考察

考古方面的较为系统的工作始于 18 世纪晚期开始的近代专门的考古研究工作。早先的代表作有詹姆斯·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的《大英帝国的民谣》(*Nenia Britannica*)和约翰·肯布尔(John Kemble)的《时间女神的葬礼:对北方民族考古的研究》(*Horae Ferales: Studies i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Northern Nations*)。^{〔2〕}近来较为系统地对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考古成果做综述著作有 C. J. 阿诺德(C. J. Arnold)的《对早期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考古研究》(*An Archaeology of the Early Anglo-Saxon Kingdoms*)和由牛津大学考古学院编写的《对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考古与历史研究》的年刊(*Anglo-Saxon Studies in Archaeology & History*)。^{〔3〕}

〔1〕 约翰·布莱尔:《盎格鲁-撒克逊简史》,肖明翰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年版。

〔2〕 James Douglas, *Nenia Britannica: A Sepulchr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Its General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London: John Nichols, 1793; John Kemble, *Horae ferales: Studies i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Northern Nations*, London: Lovell Reeve, 1863.

〔3〕 C. J. Arnold, *An Archaeology of the Early Anglo-Saxon Kingdoms*,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Anglo-Saxon Studies in Archaeology & History*, ed. Helena Hamerow, Oxford: School of Archaeology, Oxford University, 1979.